清理涉企收费别成“割韭菜”

■ 谭浩俊

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,决定在全国范围清理规范涉企收费。会议要求,集中用半年时间开展专项行动,在全国全面清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,涉及行政审批前置、市场监管和准入等具有强制垄断性的经营服务性收费,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等,用依法、规范、透明的管理制度扼制“任性”收费,挖掉乱收费的“病根”,减轻企业负担,支持实体经济发展。

挖掉乱收费的“病根”

减轻企业负担,让企业不再负重爬行,毫无疑问是当前最为紧迫,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。为何这么多的政策工具运用以后,经济复苏效果仍然难以显现,下行压力仍然十分巨大,一个很关键的原因,就是企业负担十分沉重。包括融资成本、税收、各种收费等。其中,收费更是让企业不堪重负的关键因素之一。

需要提醒有关方面的是,在清理涉企收费过程中,切不要只把眼睛盯在行政事业单位和政府性基金方面,对银行等在经营过程中的不规范性搭车收费、强制要求企业缴纳存款保证金、搭售理财产品等,也要一并清理。否则,清理涉企收费的效果会差很多,减轻企业负担的作用也会大大减弱。

众所周知,早在上世纪90年代,就组织过一轮又一轮的涉企收费检查和清理。所不同的是,当时是以加强预算外资金为落脚点的。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效,取消了一大批收费项目。特别是新的一届政府成立以来,对涉企收费更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清理和整治,仅去年就取消、停征和减免了600多项收费。然而,由于在制度端没有很好发力,没有把乱收费的“病根”挖掉,所以,各种收费项目就像“割韭菜”一样,割了以后很快又长了出来,甚至长得更大更粗。譬如过去基本没有的银行乱收费,近些年来,也是一年多于一年、一年重于一年、一年乱于一年。不然,企业的融资成本不可能年年在加重、年年在增加。自然,企业的负担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减轻、不可能不负重爬行了。

都说民间资本撤离实体产业,导致实体经济“空心化”,是因为前些年房地产市场过于暴利造成的。我们说,起因确实如此。但是,房地产市场调控已经这么长时间了,房地产市场低迷也非一日两日,为什么民间资本仍然不愿意进入实体产业呢?很关键的一个因素,就是实体企业的负担太重,盈利空间太小,无法吸引民间资本的注意力。其中,不堪忍受的各种收费,是最关键的原因。

想一想,原本就受市场需求影响、盈利空间不大了,还要承担那么重的税负、费负,还有几个民间投资者愿意把资金、时间和精力投到实体经济领域呢?愿意去搞实业呢?而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,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,没有实体企业为基础,又怎么能够维护经济的稳定和安全,推动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呢?应当说,此次金融危机德国的“独善其身”和美国的“率先复苏”,应当也必须成为我国学习借鉴的最主要经验。

用制度遏制“任性”收费

显然,中央决定用半年的时间对涉企收费进行一次全面清理,可以说已经真正看到了企业运行的艰难所在,看到了影响实体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。要知道,目前的实体企业运行,已经陷入了困难—阻力—边缘化—再阻力—再困难的恶性循环,需要得到金融等部门的支持,因为运行状况不佳,金融部门不想也不会支持。那么,运行就更加困难。相反,如果运行状况得到改善,金融支持的热情增强,企业的运行也就会更好,多数企业就不会再通过地下金融等寻求支持。

指望金融机构在企业运行状况明显不行的情况下“雪中送炭”,是不现实的。最有效的办法,就是政府能够拿出更多姿态,在税费方面少收一点、减免一点、清理一点,先让企业的负担降下来,运行状况改善起来,让银行来“锦上添花”,从而进入良性循环。

由于涉企收费范围太广、内容太多,且多数收费都是权力部门化、部门利益化的产物,如何冲破阻力,将其规范和清理,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决心的。不然,也不会清理了二十多年,乱收费问题仍然十分普遍,企业负担仍然十分沉重。更为重要的是,清掉的收费能否“长治久安”,不再像韭菜一样很快又长了出来,是考验政府职能转变、行政体制改革、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确立的关键。如果找到了乱收费的“病根”,又不能挖掉“病根”,那么,所谓清理,也就会变成走过场、图形式,无法形成对企业的真正支持。

首先,建立负面清单,将所有与企业有关的收费都列入到负面清单之中,以无罪推定的方式,确定哪些应当保留,而不是哪些应当取消。只要理由不充分,就立即取消,且不得以任何理由恢复。否则,就是违法,就需要追究责任。

第二,建立严格的预算制度,所有收费都必须纳入到财政预算统一管理,进入公共预算范畴,部门无任何支配权。即便分配到部门,也必须按公共预算要求,有具体的支出项目和效益评价措施。否则,就要取消。

第三,建立责任追究制度,对乱收费的部门和单位,一经发现,立即追责。同时,要追究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,倒逼其增强责任意识,加强对乱收费的检查监督。为了更好地防止乱收费死灰复燃,要建立举报制度,凡是收到乱收费举报的,有关方面要迅速调查,并坚决取缔和追究相关单位领导与责任人的责任。

总之,清理涉企收费,既是当前稳增长的需要,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,更是鼓励广大居民创业、创新的需要,必须做到位、做出效果、做出长治久安来。

房企
应审时度势以价换量

■ 葛丰

房地产政策近期迎来密集调整,其中包括二套房商业贷款首付最低降至四成,公积金贷款首套房首付降至两成,二套房首付最低降至三成,个人所购普通住房对外销售免征营业税年限由5年以上降至2年以上,等等。

这些政策变化符合房地产市场发展规律。毕竟,此前连续多年的紧缩性调控,本就属于“房价过快增长”市况下的应急性干预。而目前房地产市场一系列基本面变化,已经或者正在渐次落定,同时房地产投资与消费依然对稳增长、促民生具有较强正向作用,因此,这种变与不变的双重判定,决定了房地产政策理当因时回归到“鼓励居民自住性、改善性住房需求,保持房地产长期平稳健康发展”的正常基调。

不过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距离成熟尚有时日,高储蓄背景下投资渠道的相对有限,则又在客观上驱动投机、投资需求伺机而动。那么,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因为政策趋松老调重弹呢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,依据在于:

首先,尽管中国楼市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,但这个不完全的市场终究要接受市场供需关系支配性的影响,而这方面,目前关于全国楼市基本性的判断是,市场总体格局已经从此前多年供小于求转为供略大于求,部分地区甚至已出现供给明显过剩现象。譬如有研究表明,截至2014年底,不包括在建面积的全国城镇住房存量已超过232亿平方米,即使包含外来流动人口在内的城镇常住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,也已达到34平方米。

其次,排除总量过剩趋向,单以目前房价相对坚挺的一线城市而论,推动房价上行的动力也未必如想象中那样历久弥坚。其供需状况以去库存周期(待售面积/月销售面积)来看,广州在10～15个月之间,北京、上海和深圳则都在15个月上下波动。而业界认为,这一指标一般不宜超过10～12个月。此外,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,其短期政策取向尚未见“限购”松动的迹象,而长期政策取向则更需要服从于“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”的总体部署。

第三,目前出现的政策松动,仍然是一种有限度的松动。即使再退一步而言,譬如房贷政策进一步放松,但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、银行自身商业化改造的加深,以及房地产作为抵押物的预期价格变化,都会在另一个方向上制约银行配置房贷的意愿,并最终影响到房贷实际投放的数量与价格。

商界有句戏言称,“只要站在风口,连猪都会飞”。现在,对于刚刚走出“黄金十年”的房地产企业(其实也包括“炒房团”)来说,必须认识到:自己曾经所站的风口已经过去,目前的房地产市场,跟风式、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。因此,无论从其自身发展,或是消费者福利,乃至中国经济长治久安计,都应该打消幻想,审时度势,深入领会政策导向,充分把握政策机遇,通过以价换量,赢取长期平稳健康发展。

欧盟牛奶生产限额取消
国内奶粉会降价吗

■ 侯睿之

今年4月1日开始,延续了31年的欧洲牛奶生产限额制度宣告寿终正寝。一项隔了一个大洋的区域性农业政策,原本与中国一般消费者的关系也不大,然而因为国内乳制品、尤其是婴儿配方奶粉的“崇洋媚外”,使得很多家

长开始寄望未来或许能买到更便宜的进口奶粉。

然而就目前来看,答案可能会让人备感失望——原料端即使有变动,也未必能撼动目前国内的婴幼儿奶粉价格体系,一切皆源于这是个扭曲了的市场。

欧洲牛奶生产限额制度始于1984年,在这个因奥威尔的小说而符号化的年代,该制度的出台旨在保护欧洲奶农的利益。二战后,欧洲发达国家几乎都有农业补贴,保证每家每户都能喝上牛奶成为了基本福利制度,从而导致上世纪70年代欧洲牛奶生产大量过剩,“倒奶”经常上演,因此当时的欧共体就建立了限额制度,每个国家都有指定限额,如果产量超过该限额就要缴纳罚款。迄今为止,荷兰、德国、法国等欧盟区主要产奶国都被罚过。

短期而言,限额取消的影响不会很明显,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会提高产量。事实上,很多南欧国家此前并未用尽限额,因限额取消而增加生产牛奶的,业界预计主要是德国、丹麦等北欧和西欧国家,这些国家的奶源恰好也比较受中国消费者青睐。据欧盟委员会自己估计,未来一年牛奶生产只会增加1%,其中的关键在于,早在2003年起欧盟就对牛奶限额制度有所松动,每年都提高限额上限,在过去5年,虽然有限额,欧盟牛奶出口总值仍然增加了95%。

就德国、丹麦、荷兰这些可能增产的国家来看,其牛奶生产针对本国居民的需求早已严重过量,这是发达国家的通病,美国的牛奶需求量也已经持续萎缩了近十年。那么,是什么驱动这些国家增产呢?答案只能是来自外部的需求。

但目前的国际奶价实际上已经处于低位,最新的国际拍卖中,均价仅为每吨2746元,较两周又暴跌了10.8%,更不要说与去年高点3300美元相比了。因而对于欧洲的奶农来说,虽然限额没了,但持续的低奶价使得增产动力也不是很强,中国的婴儿奶粉价格再高,对欧洲奶农来说关系也不大,因为收入是按照国际奶价来结算的。

从需求端来看,因为众多消费者的过分追捧,中国的进口婴幼儿奶粉价格早就与生产成本没有太大关系,很多经济条件较好的父母只认某几个牌子的进口奶粉。这类似一些消费者追逐名牌包,牛皮的价格再便宜,巴黎老佛爷的Prada专卖店里一个包照样卖上千上万欧元。消费者对奶粉质量安全的重视程度要远高于对价格的关注,甚至异化为价格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与质量正相关的参数,譬如几款来自新西兰或欧洲的所谓“有机奶粉”,每罐400元以上照样拥趸不少。

这些年婴幼儿奶粉企业和经销商们早已在一定程度上结成同盟,价格低并不意味着能够多销,因此企业和渠道丝毫没有动力降价。去年年初,市场一度传出奶粉企业要打价格战,结果到年底盘点,主要奶粉品牌价格除了偶尔的促销外,从线下到线上都没有大幅度的下降。更吊诡的是,去年有些新进来的进口奶粉,价格也在两三百以上,笔者曾询问相关企业,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:定价太低,渠道没利润,没动力,没法推,压根儿就卖不出去。就当下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来看,价格的下跌关键还是要消费者对国产奶粉完全恢复信心,就目前来看,这还遥遥无期。

环保执法
有“牙”还须真“咬”

■ 荣启涵 屠国玺

甘肃武威荣华工贸有限公司向腾格里沙漠违法排污事件被曝光后,引发舆论关注。调查发现,去年5月至今的9个多月里,当事方通过私设暗管累计排放污水83715吨,污染面积266亩。目前,责任追究与损害评估调查正在进行。

这是2014年9月内蒙古阿拉善盟腾格里工业园区污染事件被曝光之后,又一起“沙漠污染”事件。沙漠生态已然脆弱不堪,不能让执法监管再沦为荒原。虽然荣华公司违法排污事件尚未做出最后认定,但社会期待,新环保法能够亮出“牙齿”,“稳、准、狠”地咬下去,绝不姑息。

近年来沙漠污染问题屡见不鲜。由于发达地区环保监管日趋严格,一些企业瞄准地广人稀、监管疏松的沙漠腹地,通过“转移污染”换取利益。在这一事件令人震惊之余,人们还要追问,在全国环境违法惩处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,荣华公司为何敢如此放肆顶风违法?又如何能长达数月违法排污而逍遥法外?

环境违法积弊日久。究其根源,政府监管难逃其咎:

环保执法,不能“软”。荣华公司近十年频频出现违法排污,但地方环保部门处罚太“软”,让“环境违法成本低”成为公认的常态。

环保执法,不能“拖”。荣华公司肆意排污期间,甘肃正在开展临沙、戈壁地区环境保护大检查行动,省环保部门早已拿到荣华公司排污的举报材料,层层批转而不开展深入调查,每拖一天,污染就增加一些。

环保执法,不能“避”。地方环保部门接到举报材料后并未落实检查执法,甚至隐瞒违法事实。荣华公司作为“明星”企业,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,而政府部门的庇护行为无疑助长了企业违法的侥幸心理。

“下手软、不愿管”的态度,正是纵容环境恶化的源头。有“牙”不用,势必削弱法律效力。面对环保形势的严峻,地方政府部门须用好手中的法律武器,把提升法律执行力、威慑力放在首位。别外,新环保法在赋予环境监管部门更多执法权的同时,也加强了对监管人员的责任追究。如果继续抱“不敢管、不愿管”的态度,那些地方环保部门的责任人要自食苦果。

让企业实行年金制
有多难

■ 谢昱航

让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缴纳养老保险,一个重要目的是消除养老“双轨制”带来的不公平感。之前,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不需要缴纳个人费用,而享受的养老福利相对丰厚,退休金比工作薪酬少不了多少,养老替代率高达80%以上,甚者达到90%。相反,企业员工自己掏钱买社保却享受二等养老待遇。这种现象招致了很多不满,因此,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改革赢得了一片掌声。但是,职业年金制度一推出,又可能在社会造成新的不公平感。

职业年金的好处显而易见,但目前覆盖的只是机关事业单位。当然,企业也可缴企业年金,但是它只是一种可能性,不像职业年金是强制缴纳的。员工能否享受这一福利,有赖于企业的实力和老板的善意。人社部数据显示,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,全国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为2200多万人,不到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6%。所以,虽然现在养老并轨了,但是从成本效益上分析,一些企业人员仍会有不平等感。

职业年金制度是国民所需要的养老保障。问题在于,企业年金不能强制,有些企业生存都困难,多一项强制,说不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提高企业年金普及率,现实的做法是为企业创造条件,鼓励企业改善员工养老待遇,让企业有条件有意愿实行年金制度。

中国企业负担过重是一个老话题。社保就是一个明显例子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,有人大代表指出:根据我国社保政策,社保五项(养老、医疗、失业、工伤、生育)的缴费比例,企业为29.5%至30%,虽然各地缴纳社保费率的比例略有不同,但绝大部分省市的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的40%以上,有的地区达到50%。

中国企业负担过重,还体现在社保外多个方面。比如我国增值税税率为17%,而日本增值税税率仅为5%,新加坡为7%。除了税收,中国的企业还要承担大量的非税收入,如政府性基金、行政收费等。此外,乱摊派、乱罚款、乱检查、乱培训、乱攀比、强拉赞助……都在不同程度上加重着企业负担。

减轻企业负担是国家的攻坚战。如何加强顶层设计,从根源上减轻企业负担,同时切实管住政府的手,让企业有更多自主空间,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破解的题。只有企业负担减轻了,企业以轻装上阵获得更好的发展,企业员工福利提高才有基础。

当然,企业不实行年金制度,也不全是没有条件,也有意愿的问题。在这方面,政策也有作为的空间。比如规定企业利润达到一定水平,应该缴纳企业年金。另外,也可针对性地进行税费优惠,对于实行年金制度的企业,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减税免税政策。

与其让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造成新的不公平感,不如借此机会,促进企业年金缴纳率的提高,促进国民养老待遇的普遍提高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职业年金出台后,企业年金的全面落实更有了紧迫性。